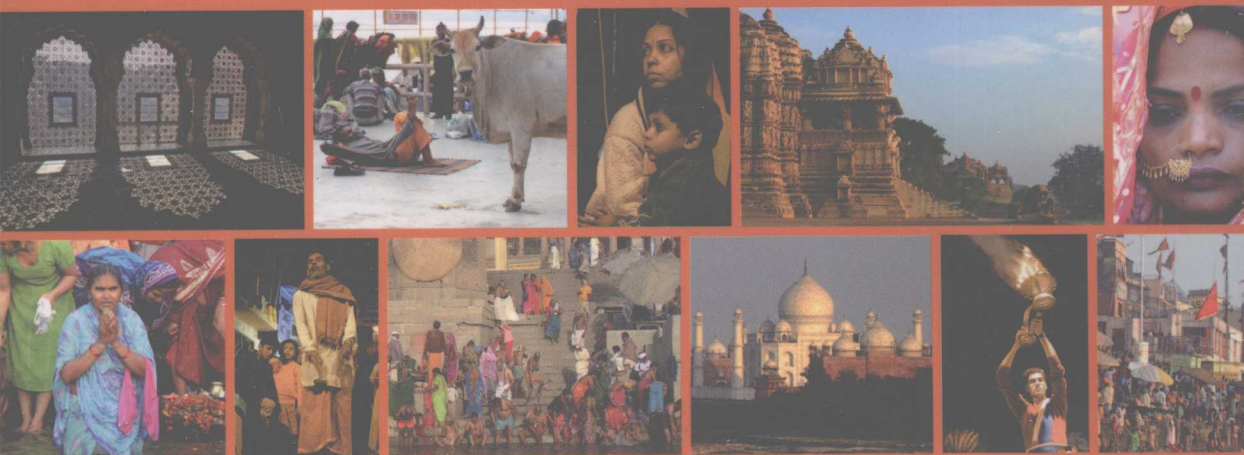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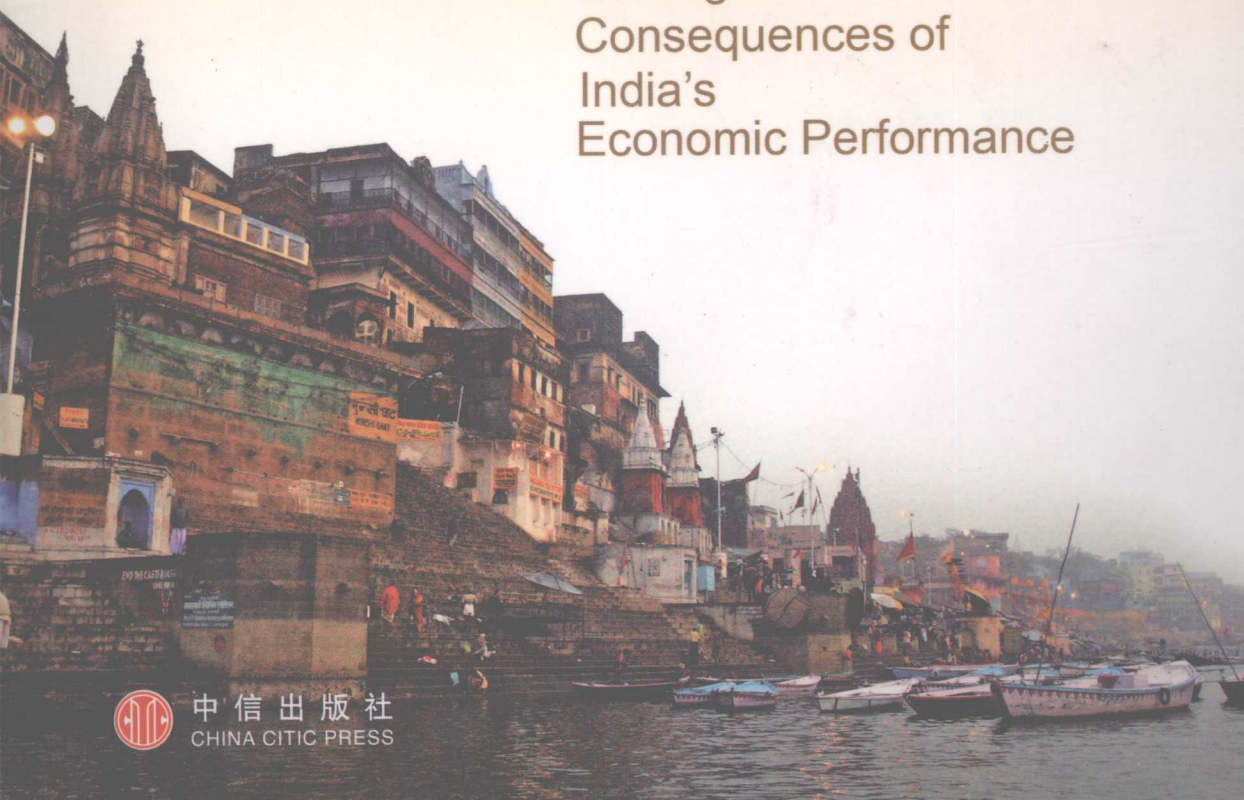




[印] 桑贾亚·巴鲁 (Sanjaya Baru) / 著
黄少卿 / 译

印度崛起的 战略影响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Ind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Ind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印度崛起的 战略影响

[印]桑贾亚·巴鲁
Sanjaya Baru
黄少卿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人对我
栏文章
章。在

的知识
在知识
使我形
策和成
西比印

印度快
启发的
与“印
书一些
会——
们，感
，它们

作都是
本书不
la fami-
出版所

，又有
——我
置疑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印)巴鲁著;黄少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3

书名原文: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Ind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SBN 978-7-5086-1092-4

I. 印… II. ①巴…②黄… III. ①经济改革—概况—印度②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研究—印度
IV.F1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606 号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India's Economic Performance by Sanjaya Baru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ACADEMIC FOUNDATION, New Delhi in 2006.

Copyright © 2006 by Academic Foundation, New Delhi

Translated in Chinese under license from Academic Foundatio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former CIT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印度崛起的战略影响

YINDU JUEQI DE ZHANLUE YINGXIANG

著 者: [印] 桑贾亚·巴鲁

译 者: 黄少卿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6667

书 号: ISBN 978-7-5086-1092-4/F·128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拉玛和檀维尔

本书收录了桑贾亚·巴鲁过去八年间（1996~2004年）的部分研讨会发言和为报刊所撰写的文章。目前，印度国内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如何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和国际安全的战略选择的辩论，本书的出版对此无疑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贡献。当前人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要求在该问题上达成广泛一致。不过，也许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这个国家第四次就类似战略选择问题发生争论。第一次发生在独立之前，当时甘地和尼赫鲁就独立后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展开了辩论。前者竭力要求建立一个分权化的农业经济并且反对以大型工业企业为基础的工业主义（以及不要进行工业化），而后者则主张加快工业化步伐。

伴随着计划委员会的成立和印度着手进行集中计划，发生了第二次争论。尼赫鲁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中间道路》的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印度需要采用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一方面，共产党（它当时掌握着11%的选票）批评他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另一方面，印度自由党则指责他走得太远了。尼赫鲁之后所确立的许可证配额制度，既是当时总体国际战略环境的结果，也是由于竞选政治中有组织的腐败和自上而下的政党控制已经初露端倪。

再往后，发生了第三次争论。由于面临国际收支危机，1991年印度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当时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不乏其人。许多极度悲观的人预言印度将充斥外国商品，而且，由于印度企业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失业率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这些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印度的经济增长不断加速，对外贸易不断增加，外汇储备也提高了；印度已经被公认为是一个IT强国；来到这个国家的业务流程外包量一直在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

现在，又出现了另一场有关印度该如何应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争论。和前几次一样，有的人主张充分利用该机会为印度谋求利益，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对此要更加谨慎。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巴鲁对国际经济秩序转型和战略环境变化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冒充和事佬。我

主张印度必须使自己适应新的全球权力平衡和经济全球化。巴鲁和我都赞成总理曼莫汉·辛格所提出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除了适应它，印度别无选择。如果你认为印度作为地理大国可以不参与全球化，那么，千万不要忘记，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幅员辽阔的经济体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实验的结局是什么。

本书的特点在于，巴鲁不断发展了他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战略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所持的整体性观点。各国之间变得日益相互依赖，建立了战略上的势力平衡，这样的全球化经济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工业化时代是没有的。过去，世界上没有能够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核武器和核导弹，知识也没有变成通行的权力。反对加强印美关系的声音大部分来自那些持风险回避态度的人们，桑贾亚·巴鲁在书中非常好地强调了中国的例子。相比于2005年的印度，1971年，毛泽东和他的同伴更有理由怀疑美国的诚意，然而，中国领导层敢于承担风险，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印度的政治体系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却不是那么熟悉。缺乏制度化的长期战略评估，智囊团寥寥无几，而且根本没有开展外交政策研究的大学中心，印度的立法者对外交政策和战略问题漠不关心是出了名的。在不结盟时代，印度被排除在国际战略发展之外。历次不结盟宣言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很少对现实情况给予深入分析。

在冷战早期，从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的情况来看，和美国结盟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好处。在那样的环境下，印度选择自主发展战略是正确的。但是，一旦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完成，在市场经济的战略性优势的作用下，和美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就开始加速发展，东亚各国和中国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目前，国际体系进入到一个六国势力均衡的新阶段，大国之间不再兵戎相见，而是在一个不断演变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秩序下展开和平竞争。

因此，要想做出正确的政策抉择以最大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印度就必须准确了解这一演变。2005年8月15日，在新德里红堡发表的独立日演讲中，总理曼莫汉·辛格讲道：“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个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可以创造历史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起点上，世界期待着我们有所作为，在全球的舞台上尽显身手。我们的发展已经没有外部约束。如果说还存在一些障碍的话，那也全部来自我们国内。”本书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克服这些内部障碍以及印度崛起所产生的影响，一定会大有裨益。因此，我们要祝贺桑贾亚·巴鲁博士所做的这一贡献。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

苏布拉马尼亚姆 (K. Subrahmanyam)

新德里

序	/ IX
导言	/ 1
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影响	/ 9
外交政策的经济考量：印度的新思维	/ 29
何谓经济安全	/ 39
开放经济下的国家安全	/ 49
咎由自取	/ 79
印度和世界：学会两条腿走路	/ 83
国家安全经济学	/ 86
孟买呼吁	/ 88
竞争优势：能力、市场与中产阶级	/ 91
经济外交的成果	/ 94
马德里僵局：印度和九国集团的坚定立场	/ 96
大国梦：印度实现潜力所面临的挑战	/ 99
外交中的商务：当今世界的贸易与旗帜	/ 102
战略要求	/ 105
令人沮丧的边缘政策：回忆一场刚被忘却的危机	/ 108
战争中对恐怖活动的经济制裁	/ 111
一个不明智的劝告	/ 114
谁需要施舍？	/ 116
谁害怕全球化？	/ 119
估量竞争	/ 122

- 做好自己的事情 / 125
- 辛格的外援政策 / 128
- 印度在坎昆会议前启动 FTA 盛宴 / 131
- 外交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 134
- 慢车道的 WTO 和快车道的自由贸易协议 / 137
- 重视对外贸易中的进口 / 140
- 开放的市场、开放的社会 / 143
- 亚洲即印度? / 145
- 印度和东盟:正在形成的迈向孟加拉湾共同体的经济关系 / 150
- 亚洲经济危机和印度对外经济关系 / 172
- 南亚对话:事关和平与安全的经济事务 / 180
- 应对信任、贸易和恐怖主义 / 183
- 南亚的双赢竞赛 / 186
- 南亚可以一起崛起 / 188
- 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选举的经济影响 / 191
- 与其他邻邦的经济往来 / 194
- IT 与信息经济:印美关系的压舱石 / 197
- 印度、中国和东盟的邻邦关系:若干外贸和外交问题 / 222
- 拉奥先生访问华盛顿 / 233
- 超越核政策:对签署 CTBT 的一个更宽泛的看法 / 236
- 谁害怕企业黑名单? / 239
- 海外信息界印度人:海外印度人的全球性网络 / 241
- 交往的条件 / 244
- 长期和短期的印美关系 / 247
- 大事不发生,情况很不妙 / 250
- 印度和美国:跳出南亚的框框 / 253
- 普京时代的印俄关系展望 / 256

八国集团峰会：不仅仅因为它存在	/ 259
经济挂帅：中国的改革	/ 262
东方曼哈顿：中国所见所感	/ 265
太平洋上的压抑情绪：美中的对峙	/ 268
中国的经济外交艺术	/ 271
新的大博弈：亚太经合组织、东盟 + 3 和新近的 JACIK，变化中的亚洲均势	/ 273
超越边界的经济事务：印中关系指引着印巴关系	/ 276
时刻关注中国	/ 279
印度是纸老虎吗？	/ 282
韩国企业时代的来临	/ 285
外交政策中的国家与市场	/ 288
印巴卡尔吉尔冲突的经济影响	/ 291
商业地理：时间、空间和技术	/ 304
传媒对国力的增强效应：印度软件的软实力	/ 307
镜头放宽点	/ 310
印度往何处去？	/ 313
附录 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	/ 316
致 谢	/ 325

托马斯·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 获得了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意味着经济学界终于开始承认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国家安全经济学的价值。而在印度, 这门学科还鲜为人知。谢林的有关冲突策略和“核博弈”的开创性研究, 使经济学超越了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经济学的更加世俗的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后, 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经济学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作为职业经济学家, 英国的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和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美国的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和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 都非常认真地对战争及其经济影响的金融意义进行了研究。实际上, 战争期间加尔布雷斯和金德尔伯格都曾供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 (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与英国外交部一直雇用大量职业经济学家为它们服务。

即便在中国, 由于苏联的解体, 国家战略的决策者在进行战略和外交政策抉择时, 也越来越重视职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一个国防部门的智囊机构中, 中国的战略家们提出了“综合国力”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NP) 的概念, 其中, 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国家安全中所占的权重要高于纯军事力量。

在形成印度的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印度的外交和国防部门却没有给予经济学家同样的重视。政府内部，经济计划者和战略决策者之间存在制度性隔离；政府以外，类似“国防研究分析所”（Institute of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这样的智囊组织从未聘用经济学家来研究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经济与金融意义。同时，职业经济学家也很少对印度的战略和外交政策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一方面是经济学家们缺乏兴趣；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智囊机构对经济学家的制度性漠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选择及其影响的经济含义存在相对被忽视的情形。

当我还是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时，我本人对这些问题也不感兴趣。成为新闻工作者以后，我开始训练自己关注印度外交政策和战略抉择的经济含义。1995年，我担任了《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的社论版编辑，当时有人要我就印度在《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永久生效一事上的立场和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的投票谈一谈看法。我告诉了我《印度时报》的社论部同事，包括资深编辑马诺·乔希（Manoj Joshi）、莫努·纳拉帕特（Monu Nalapat）和拉梅什·钱德拉（Ramesh Chandran），想首先听听他们的看法。不久，社论部规模扩大了，其他一些同事加入进来，其中有 Vidya Subrahmanyam、Shastri Ramachandran 和 Siddharth Vardarajan。早晨的社论部会议变成了关于印度核政策的研讨会，大家各抒己见，争执不下。我意识到，我必须学会引导这场声嘶力竭的争论。我向印度的战略性政策理论权威苏布拉马尼亚姆求助，希望他能够给予指导。

苏布拉马尼亚姆作为战略事务编辑加入到《印度时报》。在很长时间内，他充当了我关于印度的核政策与其历史与地理背景以及它的经济和政治考虑方面的辅导老师。我开始阅读外交事务和战略政策方面的书籍，并且定期参加“国防研究分析所”和“印度国际研究中心”（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IIC）举办的研讨会。当《印度时报》需要就印度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的投票发表看法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印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直到必需的一轮核试验完成为止。

当我在“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情报机构”及“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短暂工作期间，我对印度外交和战略政策进行经济学思考的兴趣更大了。本书中大部分文章就是在我作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时撰写的，有的文章来自我为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所准备的工作论文。1998~2001年间，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被任命为经济安全小组的召集人。

实际上，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印度外交政策的经济分析文章得到了曼莫汉·辛格博士的启发。1997年初，一本在新德里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世界事务》

(*World Affairs*) 的编辑们为了准备他们的创刊号, 专门采访了辛格博士。曼莫汉·辛格在回顾后冷战时代的早期印度进行经济改革的地缘政治背景时, 详细地谈到了中国及其他亚洲经济体是如何把经济开放和加强与西方的联系作为发展和外交政策的战略工具来运用的。

根据辛格博士的这些观点, 我为《世界事务》撰写了《外交政策的经济考量: 印度的新思维》一文(本书的第二章)。在写该文时, 我的思想也受到了尼赫鲁关于外交政策的一次演讲的影响, 这次演讲是他早在1947年12月的制宪大会上发表的(见附录)。尼赫鲁在演讲中的一段陈述深深打动了我, 让我在后冷战时代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共鸣。他说, “谈到外交政策, 国会必须牢记这不是纸上谈兵, 它背后隐藏着各种利益关系。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是经济政策的反映。”

我想, 尼赫鲁所倡导的各种外交政策, 其背后一定有深刻的经济原因。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印度独立后的外交政策是以“普遍原则”而不是以“狭隘”的民族利益为基础, 这不过是虚构的。如果经济考量是这些外交政策的基础, 那么, 谁能够否认自身利益所发挥的作用? 我曾经偶然读到波兰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革命的奠基人之一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的一篇精彩文章, 他把“混合经济”的经济理论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比喻为“一头吃两头母牛奶的聪明小牛”! 考虑到卡莱斯基完美的“左派”和反帝国主义者的形象, 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讽刺不结盟运动, 而仅仅是想给它一个形象的概括。

曼莫汉·辛格的观点在《世界事务》杂志中得到了清楚的表达, 我认为, 它把经济学重新带回到外交政策的争论之中。苏联解体后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中国际贸易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中国的重商主义和WTO的建立以及我们自己与邻国日益增加的经济往来, 这些都意味着尼赫鲁主张的对外交政策进行经济考量的观点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然而, 正是1998年的核试验极其明显地昭示了外交与战略政策选择和经济选择之间的联系。1998年5月的博克兰—II(Pokhran-II)核试验导致在经济学家和经济新闻工作者之间, 就开展核试验的金融和经济意义, 以及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对印度进行制裁所产生的成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经济时报》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认为, 由于遭受制裁和国际市场机会的减少, 博克兰—II核试验的经济成本将高达200亿美元。这一观点受到了来自巴拉钱德拉(G. Balachandran)和锡里尼哇沙·拉格哈文(T. C. A. Srinivasa Raghavan)的强有力的挑战。在《制裁: 对印美关系的观察》(*Sanctions: A Indo-US Perspective*)这一研究文章中, 两位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 “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印

度实施制裁引起了全国性的愤慨，但是，它们不会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任何严重后果。”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一位极受尊重的美国分析家、国际经济研究所（华盛顿特区）（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IIE）主席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的专业性认可。他认为，正如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印度遭受美国制裁的经历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历是一致的。像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个国家或一小群国家实施的制裁不会对它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国际经济研究所有关制裁的经典研究说明了为什么外部制裁不容易钳制印度这样的大国。博克兰—II 核试验之后，伯格斯滕到访印度，并且在“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发表演讲认为，对于1998年5月之后美国对印度的制裁所带来的净影响，他本人的估计大约为五亿美元，远远低于《经济时报》危言耸听的200亿美元。

尽管这一乐观的观点令人欣慰，但是，当时的印度政府并不想冒险。它采取了若干经济行动来减持美元，并且展开一系列外交攻势，派遣了多个由印度分析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小组到不同国家去解释，为什么印度要宣称自己是有核国家，以及为什么全世界应该充分意识到印度的良好意愿。我也被“国防研究分析所”（IDSA）和“印度国际研究中心”（IIC）挑选到参与这一活动，同苏布拉马尼亚姆·沃哈（N. N. Vohra）、贾斯吉特·辛格（Jasjit Singh）、拉贾·莫汉（Raja Mohan）及其他人一道来到许多国家的首都进行游说，希望全世界能够相信，一个有核的印度并不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威胁。

事实上，我认为，一个更加自信和安全的印度，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印度经济应该受到世界的欢迎。收录在本书中的许多报刊专栏文章，就是在这些游说途中——从东京到北京；从巴黎到华盛顿——写出来的。这一亲身经历激发了我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印度经济发展的战略影响进行经济分析的兴趣。

2002年年初，我应哈佛大学俄林战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的邀请，在其月度研讨会上宣读一篇有关经济安全的论文。我考虑把我曾经在多篇短文和专栏中所表达过的那些凌乱的思想整理成一篇文章，这便是《印度经济崛起的战略影响》一文。令我高兴的是，这篇文章得到了来自包括基辛格和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内的许多专家的积极回应。

本书的第一部分还包括了我为国家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出版的《国家安全年度评论》（National Security Annual Review）就“经济安全”概念所写的一篇文章，以及印度工商业联合会（FICCI）的阿米特·米特拉（Amit Mitra）邀请我为FICCI年度大会所写的一篇背景文章，该大会的主题正是国家安全。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了多篇讨论印度和亚洲的论文。同样，我的兴趣第一

次受到激发也是缘于我在“不结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情报机构”撰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和东盟的文章。我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广泛游历形成了许多篇报刊专栏，以及一篇论文，它是意大利《心脏地带》(Heartland)杂志编辑邀请我就“印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亚洲?”问题而作。在“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理事会”，我对印度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外贸关系进行了研究，这形成了一篇讨论印度和中国及亚洲各个经济体的外贸关系的论文。在为印度信贷评级公司(ICRA)的《货币与金融》(Money & Finance)杂志撰文分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发现，在一些国家，金融危机不久就转变成了一场影响广泛的经济危机，在有的国家，甚至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亚洲的这场经济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战略性后果，在印度尼西亚得到了最为清楚的体现。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美国的影响力则在不断减少。

2000年，作为第一个瓦特穆尔研究员(J. Watamull Fellow)，我在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度过了一个夏天，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讨论印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印美关系的影响。在我讨论印度与东盟关系的论文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孟加拉湾共同体”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孟加拉国、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经济合作组织”(BIMSTEC)的地缘经济的内在逻辑。印度当时在“南亚区域合作组织”(SAARC)上所遭受的挫折使得BIMSTEC的设想广受欢迎。不过，在我看来，BIMSTEC更应该是加强与东亚联系的桥梁，而不是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的竞争对手。

我对区域贸易集团的热情与贸易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纯粹经济原理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在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看来，区域贸易集团偏离了他们所偏好的单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议程，他们认为区域主义是WTO进程的一条迂回路线。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者看来，区域贸易集团则是多边主义的一扇“后门”。他们感到，那些无法通过WTO来实现的目标，可以通过区域集团而被寻求确保实现，因为区域集团在政治上显得更不具有威胁性。我同意那种把区域主义看成是多边主义的跳板的看法，更加重要的是，我同样认为，区域优惠和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外交政策工具。正如贸易经济学家库珀(Richard Cooper)曾经指出的，“贸易政策即外交政策”，对于区域贸易协定而言，情形更加如此。按照拉丁美洲学派对贸易政策的看法，贸易是形成“依赖”的手段，不过，我更愿意认为，国际贸易形成的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看看中国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的？通过贸易，中国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一种互利关系，这种关系获得了一种政治意义，并且影响了过去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我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印度经济发展的战略含义所做的经济分析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考虑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时，印度突出的经济表现成为一

个区分点，这在印度独立后是第一次。我认为，为了争夺卡尔吉尔，巴基斯坦要比印度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1998年以后，巴基斯坦的经济就一直呈失控状态，直到2001年后，由于9·11事件才出现好转。巴基斯坦未能从苏联的崩溃中吸取适当的教训。为了在每一个可能的战场上对抗北约组织（NATO），当年华约集团将自己武装到了牙齿，然而，他们在市场领域成为冷战的失败者。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对于所有试图通过机枪大炮来追求实力的国家无疑是一个警醒。印度汲取了正确的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逐步修复本国经济，并且使之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的经济成功同样也指明了这一方向。当今世界的力量不但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同样也是建立在经济竞争力和政治适应力的基础之上。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争论不会终止。仍然会有许多军事实力的信徒，他们把核领域的大型军事工程看成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有许多人相信，印度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不但来自其军事潜力和政治面貌，同样也取决于其经济成就。后一种观点正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我在一篇论文和许多专栏文章中都讨论过这一概念。

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印度的崛起不但受到其经济成就和战略能力等“硬实力”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其“软实力”的支持。印度“知识经济”的成长、印度的娱乐和新闻产业，还有所谓的“印度侨民”——散居世界各地的印度裔人士——建立的人际网络，所有这些同样也影响到印度的国际形象和前景。我的许多报刊专栏便是分析这些问题，它们也被收录到了本书中。

我给《印度时报》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已收录到本书，题目是《印度和世界：学会两条腿走路》，它形象地抓住了本书的核心观点。这是本书第六篇，即我在哈佛演讲一文所精心阐述的观点。这一观点很简单。印度注定要重新获得它在世界舞台上的突出位置，为了更快地实现这一点，印度必须确保更快的经济增长步伐、更有效率和更加公正，而且能够创造出维持一个稳健的战略政策所必需的财政收入。在一个开放社会的架构下，公正的增长将改善国内安全和确保政治稳定；在一个开放经济架构下，更有效率的增长将推进外部安全。

在殖民活动开始以前的世界中，印度、中国和欧洲是势力均衡的三极。欧洲的殖民活动弱化了印度和中国的实力。20世纪的历史是一个逆转这一过程的历史。在21世纪，在一个新的“多极”或“多中心”的世界中，印度和中国将重新回到它们的位置。尽管美国将继续是一个突出的大国，但是它将不得不适应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崛起的雄心。对于印度来说，同中国等其他国家一样，要想恢复在国际舞台上所失去的位置，就需要获得经济发展和日益增强的国家能力。除非印度经济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和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

除非所有印度人的福利得到确保，除非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否则，印度不但将无法维持自己作为大国的地位，也不能获取综合国力的其他属性，不管是“硬”国力还是“软”国力。

因此，印度在世界舞台的再次崛起是其经济和战略能力增强的结果。印度优异的经济表现必然会产生战略性影响。它使得印度能够更好、更经济地参与世界事务。它将有助于建立新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能给国际关系带来良性影响。它将增强印度政府的财政能力，从而可以在战略能力方面进行投资。随着政府有新的财力进行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投资之后，它还将减少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局面。最后，它还将有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正和有效率的增长局面，而这又能进一步减少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

20世纪最后十年，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出现了新的转折——加入WTO之后印度企业的成功表现、一个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核能力的展示以及面对多重复杂的挑战，作为开放社会和开放经济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所有这些构成了印度对后冷战时代重构全球势力均衡的回应。本书所收录的这些论文和专栏，是在十年的时间里陆续为不同的读者而写的，它们对印度在世界舞台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个经济和战略层面的观察。

所有这些论文的写作和出版都是我到总理办公室任职之前的事情，它们不代表印度政府或总理的观点，本书不包括任何在我目前的职位才能获得的信息。

